

# 开放性：“新子学”理论构建进程中的基本取向

张耀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241)

〔摘要〕学者参与“新子学”理论构建时秉承着开放的心态与视野,“开放性”可被视为“新子学”理论构建进程中的基本取向。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研究者对于“新子学”的界定有着开放性,“新子学”话题的选择有着开放性,“新子学”对于研究者也有开放性。“开放性”同时可能导致探讨焦点的分散,“新子学”研究者通过一些主导话语和会议论坛来调节,避免了其负面效果。

〔关键词〕新子学;开放;多元;话题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18)03-0046-07

从2012年方勇教授发表《“新子学”构想》至今,学界对于“新子学”的探讨已持续了五年,期间形成论文百余篇<sup>①</sup>,大小会议十余场<sup>②</sup>,不得不说这是近期中国学界较为瞩目的学术现象。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热点,陆续撰文总结学界相关的探究成果<sup>③</sup>,本文不再详细展示这些成果,而是要分析这一理论建构的过程,总结这个过程本身所体现的学术研究特色。这些特色具体表现为学者在探究“新子学”时所普遍、一贯坚持的几类基本取向,限于篇幅,仅就其开放性这一类展开阐述。

所谓“开放性”,是指学者参与“新子学”理论构建时秉承着开放的心态与视野,学者讨论“新子学”并没有刻意为它划界,而是把它的研

究当成一个开放的平台,除了自己发声外,也积极吸纳其它领域学者带入其他类型话题来丰富“新子学”的论述,这些论述多样甚至冲突,但在这个平台上又能实现对话,“新子学”理论便在这种对话中逐渐构建、逐渐完善。这种“开放性”在“新子学”理论构建的活动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新子学”界定的开放性、对于“新子学”话题的开放性、对于“新子学”研究者的开放性。下面将对这三个方面依次展开论述。

## 一、“新子学”界定的开放性

当前许多从事理论创新工作的学者大多都是

〔收稿日期〕2018-01-03

〔修回日期〕2018-03-06

〔作者简介〕张耀(1991—),男,山东枣庄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先秦诸子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

① 这些论文曾发表在《光明日报》《探索与争鸣》《河北学刊》《中州学刊》《江淮论坛》《人文杂志》《艺术百家》《集美大学学报》《诸子学刊》等刊物上,目前已被编入《“新子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新子学”论集(二辑)》(学苑出版社2017年版)两部书中。

② 这些会议包括:2012年10月27日上海“‘新子学’学术研讨会”、2012年12月1日上海“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遗产——现代文化学者视野中的‘新子学’研讨会”、2013年4月12至14日上海“‘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4月12至13日上海“诸子学转型高端研讨会”、2014年12月1日上海“‘新子学’与现代文化:融入与对接——新媒体时代‘子学精神’传承与传播学术研讨会”、2015年4月18至20日上海“第二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10月22日屏东“2016‘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11月28日厦门“‘新子学’深化:传统文化价值重构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10月27至29日台北“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11月6日上海“海峡两岸‘新子学’座谈会”。此外,2015年在韩国召开的“21世纪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庄子》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都把“新子学”列为议题之一。

③ 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包括:曾建华(曾建华:《“新子学”理论建构现状与反思》,《诸子学刊》(第十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225页)、何浙丹(何浙丹:《现代学术视野下“新子学”的困境与出路》,《诸子学刊》(第十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246页)及高卫华等人(高卫华,杨兰,董浩烨:《我国“新子学”研究现状与问题》,《诸子学刊》(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138页)。

在现有的学科框架下展开理论构建,清晰界定自己理论所属学科门类、与之前理论的因革及所针对的现实问题等等,因此他们首先会对这一理论的命名进行详尽的概念分析,由此界定其内涵。那么,之后的探讨者只能在这一框架内阐发、运用该理论,想融入自己独特理解便很困难,新说总与原说有龃龉之处,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理论自身内涵的丰富与延伸的。“新子学”的理论构建者警惕着僵硬的框限所带来的弊端,在界定自身时预留了很多开放的空间。这主要反映在该理论发起人在界定“新子学”命名内涵时坚持了开放性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子学”自身概念在学界中的多元化定义。

具体来看,方勇先生《“新子学”构想》一文是“新子学”理论的开端,在本文中,方先生主要针对“新子学”的概念和范畴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首先,该文回顾“子学”发展的历史,进而提出:“子学正再一次与当下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律动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sup>[1]</sup>之后,该文对“新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大致界定:

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具体内容上,则应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前者侧重思想,后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均不在子学之列。<sup>[1]</sup>

可见,关于“新子学”这一概念,《“新子学”构想》一文并未给出特别确切、细致的界定,正如之后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方勇教授已经对‘新子学’进行了阐释,但并未对‘新子学’的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我们并不期望‘新子学’概念的界定毫无争议,相反,我们认为更多的思想碰撞,不同的观点交锋更有利于‘新子学’的发展和完善,百家争鸣才是我们对现代和今后的中国文化环境的期待和践行。”<sup>[2]</sup>这种理解应该也反映了方先生的初衷,“新子学”应该是在众人讨论中不断完善的一套理论,所以在初期界定它概念时没有设定太多的框框,而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学者在“新子学”这一概念的定义上呈现了多元化特征,为“新子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多种可能。

在早期讨论“新子学”的文章中,经常会涉及到对“新子学”概念的定义,这时不同学者立足不同视角、出于不同关注就会形成各自不同的定义。一些学者立足于学术史视野,从研究方法革新的层面来定义“新子学”。持此观点的文章多先剖析“子学”作为一种学术门类其自身的性质、特点和地位,然后由此深发,引出“新子学”的概念并阐释之。如刘韶军先生界定“新子学”时指出:“‘新子学’就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sup>[3]</sup>另如张永祥先生认为:“新出土文献、大型典籍整理、全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用更为系统的科学方法对传统子学进行新的学术重建工作,子学研究重新崛起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一个‘新子学’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sup>[4]</sup>上述对“新子学”概念界定的思路体现着鲜明的纯学术色彩,由此“新子学”的属性被固定在学术圈的范围之内。这种界定突出了“新子学”对当前子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有着极强的针对性。

但“新子学”概念的界定是多元的,学者们视角不同,所界定的“新子学”也不尽相同。当我们用思想史、文化史这层视角来审视时,会发现对“新子学”还会有更多样的理解。比如一些学者不希望将“新子学”界定为明晰、固定的学术概念,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方向或思潮的笼统表达。景国劲先生提出:“‘新子学’,按照我的理解,它不是一个很严格的学术术语,它是一种状态的描述,或者是一种方向性的倡导。”<sup>[5]</sup>王昀、谢清果两位学者则认为:“‘新子学’与其说是一种概念,一种理论阐发,不如说是一种新视角,甚至于一种社会思潮之代表。”<sup>[6]</sup>陈成吒先生更是明确指出:“大体而言,‘新子学’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即哲学性‘新子学’和学术文化性‘新子学’。第一个层面,即理论层面,它是在面对自身与世界时基本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以此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哲学,可以称之为‘新子学’哲学。第二个层面,是指在这种全新哲学的观照下,对学术文化所进行的重新发现、梳理、建构和发展,可以称之为‘新子学’学术文化工程。”<sup>[7]</sup>基于思想史、文化史角度,这些学者定义“新子学”不再立足于

“子学”为基点,或者说他们理解的“子学”有了更超越的内涵,这些都让他们所定义的“新子学”呈现出某种独特、深刻的形态。

学界对“新子学”多元的定义典型地说明了“新子学”理论构建时的开放性取向,当一个理论在自身命名的界定上都预留有如此大的开放空间,那么它留给参与者发挥的空间无疑会更多。

## 二、“新子学”话题的开放性

综观“新子学”研究文章,其所涉话题的丰富多样令人印象深刻,这得益于子学本身的宏大内涵,也得益于“新子学”研究者选择话题时开放包容的态度。“新子学”发展初期,文章的话题多集中在“经子关系”“子学与西学”“‘新子学’与新儒学”等板块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核心的话题。但“新子学”不仅仅是诸子学本身的革新,它也承载着学界许多领域自我革新的诉求,由此它又牵涉了许多相关的话题。学者经常结合这些话题对“新子学”展开探讨,尤其在近些年,这类模式的文章比重不断上升,说明了学界选择话题时越来越认可这种开放性的取向。

具体来看,因为各学者所擅长的学术领域不同,他们所探讨的话题也各有侧重。如孙以昭先生《“新子学”与跨学科、多学科学术研究》<sup>[8]</sup>、姜声调先生(笔名凌然)《“新子学”与跨学科学术研究鸟瞰》<sup>[9]</sup>两篇文章聚焦“新子学”对当代学术的跨学科研究的启发性意义,将“新子学”和当代学术的前沿话题结合起来。此外,当代文化的前沿话题也进入了“新子学”的讨论中,这方面,郝雨先生有较为突出的成果,他撰有《“新子学”与现代文化:融入与对接》<sup>[10]</sup>《“新子学”对现代文化的意义》<sup>[11]</sup>《“新子学”与中华文化整体传承》<sup>[12]</sup>等系列文章,着重探讨了“新子学”在构建当代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还有谢清果先生《还原、重构与超越——“新子学”视域下传统文化传播策略》<sup>[6]</sup>《新子学之“新”:重建传统心性之学——以道家“见独”观念为例》<sup>[13]</sup>等文章,结合着文化传播的问题、传播学的理论来阐发“新子学”的意涵与

价值,亦有独特创获。王、谢两位先生的成果只是一个缩影,其实从事当代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新子学”有着普遍的关注,至今以“新子学”与现代文化及文化传播为主题的会议已举办有三次(可参考前文注释),会议中很多学者针对这方面的话题都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极大丰富了“新子学”的讨论成果,具体内容可参考毛冬冬、刘凯两位先生的相关会议综述。<sup>[39]</sup>另如王斐女士《“第三极文化”体现的“新子学”精神》<sup>[14]</sup>、张勇耀女士《构建“新子学”时代新的女性话语体系》<sup>[15]</sup>,她们在探讨“新子学”时同样涉及了当代文化中如“第三极文化”“女性主义”等前沿理论问题。

以上话题主要集中在学术文化领域,更倾向人文科学的范畴,除此之外,社会科学中的很多话题也进入到了“新子学”这个开放的平台当中。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政治学研究与“新子学”的结合,在“第二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有学者对此专门进行评述:“‘新子学’的发展不仅是理念的提出,也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实际推进上。本次大会的一个亮点是诸子国家治理思想的讨论,共有16位学者撰写了诸子政治思想的论文,形成了诸子学在政治治理领域的一个突破……总的来看,此次会议在诸子政治学方面打开局面,初步显示了诸子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为今后的诸子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可以说是‘新子学’在研究领域的一个实际推进,是本次大会重要的成果。”<sup>[16]</sup>同时,“新子学”对经济商业领域的研究也是开放的,郑伯康先生《“子商”构想》<sup>[17]</sup>《“子商”再思考》<sup>[18]</sup>两篇文章将工商管理领域的话题带入“新子学”的探讨中,用“新子学”指导商业理论的创新,提出“子商”的理念,作为传统“儒商”理念的革新。郑先生这种思路极有创造性,而这种创造的前提无疑是“新子学”理论构建中所预留的巨大开放空间,正是这种开放性的取向才孕育了之后创造性的理念。

## 三、“新子学”研究者的开放性

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新子学”的讨论不限

于“先秦哲学”这一个小圈子，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可以在“新子学”这个平台上发声，这反映了“新子学”对于研究者的开放性。开放性不仅体现为研究者在学科背景上的多样性，更体现为研究者在文化背景上的多样性。

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在“新子学”刚起步时便参与了它的讨论，他们的文化背景相比大陆有一定的差异，故而他们的意见更有特色，很值得重视。如澳门大学邓国光先生讨论“新子学”意义时指出“在集部，有新文学；在经部，有新经学；在史部，有新史学。但作为时代理性思维象征的‘子学’，独落后于斯。可幸的是，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如此整个四部学术能共同在相同方向上各显辉煌。‘新子学’过滤芜杂的伪饰，醇化子学的本质，重建中国学术话语，启动思想，发愤人心，重振灵魂，积极解决新时代的深层次困扰，而期向未来生活世界的整体幸福。就世界文明格局的重新调整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sup>[19]</sup>。该文从四部学术的开新层面谈“新子学”意义，视野很宏大。再如香港浸会大学黄蕉风先生《告别路径依赖 构建大乘墨学——“新子学”视野下的墨学发展进路》<sup>[20]</sup>一文则结合“新子学”为“大乘墨学”的推广、实践作了更具体的构想，思路很独特。“新子学”与台湾学者的联系更为密切，2016年和2017年分别在台湾屏东和台北地区召开了两次“新子学”学术研讨会，2017年在上海也举行过海峡两岸“新子”学座谈会。据此契机，“新子学”与一些台湾重要的思想流派实现了对话，如台湾当前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王邦雄先生与曾昭旭先生、跨文化庄子学代表人物赖锡三先生等学者都结合自身的理论阐发了自己对“新子学”的认识。比如赖锡三先生在《大陆“新子学”与台湾新庄学的合观与对话——学术政治、道统解放、现代性回应》一文中，归纳了大陆“新子学”与台湾新庄学的共性：“简言之，大陆新子学和台湾新庄学，皆企图解构‘以一御多’的文化中心论、本质论、主干论，并由此解构而走向学术自由、文化多元的多音复调。”<sup>[21]</sup>在“现代性回应”方面，赖先生也指出了“新子

学”与新庄学存在的些许差异，他认为“新子学”有着“中国优位的关怀与东西细微二分的前见”。<sup>[21]</sup>而台湾的新庄子学则“主张借由跨文化机遇来更新转化传统，从而产生内外语境交织的混杂现代性”，<sup>[21]</sup>“方教授领军的‘新子学’研究工作团队，似乎以返回中国性的‘新之子学’为主要工作目标。而台湾的跨文化新庄子学则以中国性和世界性的互文交织、以创造‘新子之学’为主要工作目标”。<sup>[21]</sup>无论是共性还是差异，对于“新子学”理论构建都是重要参考，“新子学”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接纳其他思想流派的意见，通过这些来自“他者”的意见来更客观的反观自身，促进自身理论的构建。

韩国、新加坡等也有很多学者参与了讨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严寿澂教授撰有《“新子学”典范——章太炎思想论纲》<sup>[22]</sup>《新诸子学与中华文化复兴》<sup>[23]</sup>系列文章，着重凸显章太炎先生对于“新子学”理论构建的典范意义。韩国学者对探讨“新子学”似乎有着更高的热情，关于“新子学”探讨的成果十分丰富，如韩国圆光大学姜声调先生（笔名凌然）《“新子学”与跨科学术研究鸟瞰》<sup>[9]</sup>《在韩国如何推广“新子学”》<sup>[24]</sup>，以及韩国成均馆大学曹致焕先生《“新子学”与“狂”的现代意义》<sup>[25]</sup>，还有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金白鉉先生《21世纪“新子学”与新道学的研究课题》<sup>[26]</sup>，可见，韩国学者致力于开掘“新子学”更独特的思想意涵，将“新子学”与自己的学术兴趣点结合，开拓了“新子学”理论构建的路径。

甚至远在欧美学界，“新子学”理论也得到了回应，这类研究者来自于差异性更大的西方文化背景中，他们的研究经常能“跳出中国看中国”，将中国置于中西关系乃至世界多元格局的视域中去考察，由此对“新子学”进行了别有特色的阐释。例如，德国海德堡大学 Viatcheslav Vetrov 先生撰写专门的讨论文章——《“新子学”：汉学主义的替代者？》（China's New School of Thought – Masters (Xinxixue): An Alternative to Sinologism?），本文核心的理论关怀在于探讨认同建构（identity construction）与政治表态

(political statement) 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基于这一视域, 该文展开了对当前中国相关理论流派的论述。总体来看, 该文是以“认同”(identity)与“政治”(politic)为主线贯穿全篇, 由此分析对比一系列的学术现象(如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对西方主义的批判、对汉学主义的批判及“新子学”运动等), 该文引言对这一思路有较为鲜明的、概括性的表述:

本文意图对这些尝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sup>②</sup>本文最终的论述涉及到“新子学”的讨论, 这是当下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学术运动之一。如果说顾明栋强调学者拒斥政治关怀的必要性, 并以他的汉学主义论著取代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 那么本文的问题便是, 当“新子学”的支持者更倾向于认为拒绝政治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新子学”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取代汉学主义的新选择。<sup>[27]</sup>

知识与权力间的关系是西方学界的热点, 该文以此为基本视域探讨“新子学”的意义, 这一思路较为独特, 对我们极有启发。一直以来研究者在相近的文化背景中讨论“新子学”, 虽然挖掘得很深入, 但格局容易被局限, 路径容易导向偏执。该文从西方学术的立场, 以一定的距离审视这场中国的学术运动, 自然有山外看山的效果。

“文化认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国家都需要应对的挑战, 学者构建“新子学”理论也是致力于这一目标, 只是对此没有专门明确的表述。Vetrov 先生致力于中西方跨文化研究, 故而从“文化认同”这一角度来理解“新子学”, 在“中国-世界”这一维度上探讨“新子学”的意义, 这种来自异质文化圈的审视能帮助我们反观自身, 启发我们在之后的探讨中更多地思考“新子学”如何帮助中国文化以一种恰当的姿态融入全球化浪潮。在此基础

上, 该文还分析了“新子学”对于西学的开明态度、“新子学”与政治的恰当关系等方面, 本文限于篇幅不详细介绍。

回顾“新子学”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 我们更可以体会到“新子学”研究作为一个平台其鲜明的开放性, 这个平台不仅属于中国, 更属于世界, “新子学”研究者今后应继续坚持这种开放性, 认真对待、积极回应来自不同学术圈、文化圈的声音, 进而形成积极的互动, 吸引更多广泛的学者加入讨论。

## 四、结 语

“开放性”为“新子学”的发展开拓了广泛的空间, 但它又是把双刃剑, 如果没有恰当的调节, “开放性”可能会让“新子学”探讨成为漫无目的的众声喧哗。不过从目前来看, “新子学”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调节还是比较成功的, 具体来说, 在“新子学”的探讨中存在一些具有主导力量的话语, 这无形中会左右学者讨论的方向, 比如在“新子学”刚提出之后的两年中, 学界对它各抒己见, 可谓“众说纷纭”, 这时理论首倡者方勇先生便发表《再论“新子学”》<sup>[28]</sup>一文, 在其中提出“子学精神”这一说法, 这一概念有着极强含括性与总结性, 故而之前学术关怀各不相同的学者纷纷聚焦这一话题进行讨论, 仅相关论便有近十篇之多, 如《子学精神与“新子学”建构刍议》<sup>[29]</sup>《传统子学精神与“新子学”的责任和使命》<sup>[30]</sup>《重建当代知识分子的“子学”精神》<sup>[31]</sup>《“新子学”文化源流及其价值诉求》<sup>[32]</sup>《论“子学思维”与“子学精神”》<sup>[33]</sup>《关于“新子学”的几点浅见》<sup>[34]</sup>《“新子学”学科定位与杂家精神》<sup>[35]</sup>《“新子学”与杂家》<sup>[36]</sup>《固本培元 革故鼎新——儒道

① 该文指出:“本文捍卫如下观念:对于任何认同建构的讨论,任何划定边界的行为,以及对这种划界行为的批评,这些都可以视为一种政治表态。因此,每当展现出对政治立场的明确否认,或者并未反映出已经介入政治,这些研究每每都会出现问题。”详见:Viatcheslav Vetrov. *China's New School of Thought-Masters (Xinxixue): An Alternative to Sinologism?* [J]. *Asiatische Studien*, 2016 (3): 731-755.

② 笔者按:“这些尝试”是主要指王铭铭先生等学者批判西方主义时、顾明栋先生批判汉学主义时做出的疏离政治的努力,即原文所谓:“尝试使自己处于中立的立场,以此来克服政治,使之不在场。”详见:Viatcheslav Vetrov. *China's New School of Thought-Masters (Xinxixue): An Alternative to Sinologism?* [J]. *Asiatische Studien*, 2016 (3): 731-755.

学说与“新子学”的发展》<sup>[37]</sup>《“新子学”与“狂”的现代意义》<sup>[25]</sup>《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子学”之“关注现实”的思考》<sup>[38]</sup>，等等。可见“新子学”研究者对话题除了有开放的态度外，也有整合的追求，这些工作避免了开放平台上学者各自言说、话题过于分散的情况。另外，学术会议的举办也为学者提供了互动的契机，有利于学者间的话题形成交集，进而提炼出更具焦点性的话题，这对话题分散的状态同样是一种调节。

21世纪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世纪，“新子学”作为在这个新时代产生的新理论，自身理应有“开放”的特质，“开放性”应被进一步凝结为学者参与“新子学”理论构建时的基本取向，它是“新子学”之前取得成就的前提，更是“新子学”之后进一步发展的保障。

#### 【参考文献】

- [1] 方勇. “新子学”构想 [N]. 光明日报, 2012-10-22 (014).
- [2] 高卫华, 杨兰, 董浩烨. 我国“新子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M] // 诸子学刊: 第九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27-138.
- [3] 刘韶军. 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 [J]. 江淮论坛, 2014 (1): 59-64.
- [4] 张永祥. 反者道之动——从子学走向“新子学” [M] // 诸子学刊: 第九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35-42.
- [5] 计虹, 白新茹. 现代文化学者讨论“新子学”纪要 [M] // 诸子学刊: 第九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89-200.
- [6] 王昀, 谢清果. 还原、重构与超越——“新子学”视域下传统文化传播策略 [M] // 诸子学刊: 第九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401-408.
- [7] 玄华. 关于“新子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J]. 江淮论坛, 2013 (5): 104-109.
- [8] 孙以昭. “新子学”与跨学科、多学科学术研究 [J]. 河北学刊, 2015 (5): 183-187.
- [9] [韩国] 凌然. “新子学”与跨学科学术研究鸟瞰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55-267.
- [10] 郝雨. “新子学”与现代文化: 融入与对接 [J]. 集美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16 (3): 17-20.

- [11] 郝雨. “新子学”对现代文化的意义 [N]. 文汇报, 2012-12-17 (00C).
- [12] 郝雨. “新子学”与中华文化整体传承 [M] // 诸子学刊: 第九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67-172.
- [13] 谢清果. 新子学之“新”: 重建传统心性之学——以道家“见独”观念为例 [J]. 人文杂志, 2017 (5): 14-24.
- [14] 王斐. “第三极文化”体现的“新子学”精神 [J]. 艺术百家, 2013 (S1): 55-57.
- [15] 张勇耀. 构建“新子学”时代新的女性话语体系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11-216.
- [16] 刘思禾. 发掘诸子治国理念 [N]. 光明日报, 2015-06-08 (016).
- [17] 郑伯康. “子商”构想 [M] // 诸子学刊: 第九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417-422.
- [18] 郑伯康. “子商”再思考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415-420.
- [19] 卿希泰, 谭家健, 王鍾陵, 等. “新子学”笔谈 [N]. 文汇报, 2012-11-02 (02).
- [20] 黄蕉凤. 告别路径依赖 构建大乘墨学——“新子学”视野下的墨学发展进路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405-413.
- [21] 赖锡三. 大陆新子学与台湾新庄学的合观与对话——学术政治、道统解放、现代性回应 [M] //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编. 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 2017: a4-1-a4-24.
- [22] 严寿激. “新子学”典范——章太炎思想论纲 [M] // 诸子学刊: 第九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383-400.
- [23] 严寿激. 新诸子学与中华文化复兴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57-170.
- [24] 姜声调. 在韩国如何推广“新子学”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349-457.
- [25] 曹玟煊. “新子学”与“狂”的现代意义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329-337.
- [26] 金白铉. 21世纪“新子学”与新道学的研究课题 [M] // 诸子学刊: 第九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257-268.

- [27] VIATCHESLAV VETROV. China's New School of Thought – Masters (Xinxixue): An Alternative to Sinologism? [J]. Asiatische Studien, 2016 (3): 731 – 755.
- [28] 方勇. 再论“新子学” [N]. 光明日报, 2013 – 09 – 09 (015).
- [29] 李桂生. 子学精神与“新子学”建构刍议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3 – 31.
- [30] 唐旭东. 传统子学精神与“新子学”的责任和使命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27 – 133.
- [31] 逢增玉. 重建当代知识分子的“子学”精神 [J]. 名作欣赏, 2015 (1): 19 – 21.
- [32] 景国劲. “新子学”文化源流及其价值诉求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63 – 68.
- [33] 欧明俊. 论“子学思维”与“子学精神”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1 – 22.
- [34] 郭丹. 关于“新子学”的几点浅见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43 – 46.
- [35] 林其铨. “新子学”学科定位与杂家精神 [J]. 中州学刊, 2015 (12): 146 – 152.
- [36] 张双棣. “新子学”与杂家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81 – 284.
- [37] 张洪兴. 固本培元 革故鼎新——儒道学说与“新子学”的发展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323 – 328.
- [38] 耿振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子学”之“关注现实”的思考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71 – 177.
- [39] 毛冬冬, 刘凯. 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探源与经典传播——“子学精神”传承与传播研讨会综述 [M] // 诸子学刊: 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439 – 445.

## Openness: A Basic Orientation for Xinxixue Theory Construction

ZHANG Y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Scholars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Xinxixue with an open mind and view, and thus “openness” should be taken as the basic orientation for Xinxixue theory construction, which could b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researchers define Xinxixue with an awareness of openness, thus the definitions of Xinxixue seem diverse and pluralistic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econd, open Xinxixue topics, including classic ones as well as topics about modern academics, contemporary culture politics and economy. Third, Xinxixue is open to all scholars,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Macao, Taiwan, South Korea and some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even scholars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 The openness may cause scattered focuses, but this problem can be resolved by Xinxixue researchers through offering some dominant topics and seminars.

**Key words:** Xinxixue; openness; pluralism; topic

(责任编辑 杨中启)